

霁光人文丛书

古代礼学礼制文献研究从稿



闫宁著



霁光人文丛书

古代礼学礼制文献研究丛稿

闫宁著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礼学礼制文献研究丛稿/同宁著.—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霁光人文丛书)
ISBN 978-7-100-15315-7
I . ①古… II . ①同… III . ①礼仪—古籍—中国—文
集 IV . ①K8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360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古代礼学礼制文献研究丛稿

同 宁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 7 8 - 7 - 1 0 0 - 1 5 3 1 5 - 7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75

定价：48.00 元

本书为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表记》与先秦儒家‘仁义礼’三位一体思想体系的建构”(16ZX07)成果。

《霁光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黄细嘉

副主任：黄志繁

委员：王德保 张芳霖 江马益 习细平

出版前言

2015年,国家提出高等教育的“双一流”战略。为了对接这一伟大的战略部署,南昌大学实施了“三个一”工程,即建设一批“一流学科”、“一流平台”和“一流团队”。南昌大学人文学科也有幸被列入“一流学科”建设行列,获得了一定的经费资助。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是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为了提升人文学院的学术水准,经过教授委员会讨论,学院选取了16本质量比较高的学术论著,命名为“霁光人文丛书”,统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谷霁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虽是湖南人,但却长期在江西工作,对江西的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学术界提起江西史学研究,必提谷老。他亲手创办的历史系,也成为目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的三个系之一。2017年5月,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在学校支持下,举办了“纪念谷霁光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传统军事、经济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目的在于继承谷老精神,弘扬人文学术。因此,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霁光人文丛书”,一方面是为了承续谷老所倡导的刻苦、专一和精深的优良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霁光”这个名字,隐喻南昌大学人文学科的美好愿景。

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1日

小 引

本书第一部分收录了四篇先秦礼学研究论文，主要围绕《礼记》中“义数之辨”这一重要问题，也旁及孔子、荀子的礼学思想。谈到“礼学”这一概念，原本不当仅仅局限于对具体礼仪制度的考证（尽管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持类似态度）。如对《礼记》一书，自来的看法可用“难而可贵”来概括，言其“难”，固然在于仪文度数之难明，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中说：“《礼记》之难读甚于《仪礼》远矣”，便是因为其“文奥而仪繁”“名物制度之琐碎纷若而不一致”，但诚如钱玄先生在《三礼通论》中指出的，自郑玄《三礼目录》，“礼”便已用作“三礼”之总称，而不专指偏重礼制的《仪礼》。徐复观先生也曾说：“礼可以概括仪，仪不能概括礼”（《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无疑是十分有道理的。事实上，《礼记》为历代很多学者推重，正是由于其所记录的关于礼之精神的讨论，清人焦循《礼记补疏叙》云：“《周官》《仪礼》一代之书，《礼记》万世之书……‘时为大’（笔者按，出自《礼运》）此一言也，以蔽万世制礼之法可也。”曹元弼《礼经学》亦云：“既明礼文，尤当明礼意”，而“义在《礼记》”，还认为“据《礼记》以读《礼经》，其学乃神”。本书所涉及的先秦礼学正是侧重礼之精神内涵、哲学意蕴而言。

礼义可贵，而对其研究也并不比名物制度考证来的容易，《礼记》中的哲学，涵盖范围甚广，更不是一句“时为大”便可以概括（事实上，焦氏《补疏》仍是偏于礼制考证），龚建平先生《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研究即涵盖了天道观宇宙观、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且有极多创获，不过我们认为，关于礼的哲学，最核心的问题是义与数，也就是礼的形式与内容间关系。从思想史角度看，“义数之辨”可上溯至于孔子哲学中仁与礼的关系，也和荀子礼学中情与文有关，贯穿了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礼的本质无疑有着最直接的帮助。《礼记》中不少篇章涉及这一话题，例如：“太上贵

德，其次贵施报。”（《曲礼》）“礼以义起。”（《礼运》）“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礼器》）“礼之所尊，尊其义也。”（《郊特牲》）“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仲尼燕居》）“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表记》）等等。对于这些说法，古代注家多倾向于理解为：一方面，礼制的变动（数）主要是由政治、社会需要（义）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礼义甚至可以生成礼文；同时，行礼是否成功则取决于行礼者的道德修养、情感真挚程度等内在因素（义）。概言之，便是《郊特牲》所说的“礼之所尊尊其义”。这样的思路与将《论语》中“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等说法解释为仁重于礼，甚至仁决定礼可谓一脉相承，而现代研究者中大多数仍然认同这样的解读。不过，当我们回到《礼记》文本脉络中进行分析便会发现，把以上这些命题一概解读为“义重于数”的说法大多其实难以成立，甚至颇有“削足适履”之嫌。事实上，《礼记》中“义数之辨”这条线索牵动着当时言礼者更为精致、复杂的思考，这些思考在理论上最大的特点便是立足礼来讨论仁、义等重要范畴间的关系，其思想倾向总体偏于外向而非内向，从这一点出发，对于礼的哲学自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书中第二部分主要是礼制史领域的考证，涉及魏晋南北朝宗庙制度及元代宗庙礼。清人陈醴曾赞誉郑玄礼学“非但注解，且可为朝廷定制也”。对于中古郊庙制度沿革，以往研究也多是从郑玄与王肃经说对立的角度切入，不过中古郊庙礼并不是简单地由经入史转换而形成。首先，想要从史料较为简略的仪注记载中识别出其背后经学思想，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从两晋几次有代表性的郊祀制度变革中，我们即可观察到一些单就郑、王经学理论难以完全解释的现象，这固然与二人学说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但也反映出当时学者在实际制礼过程中常常对经学理论进行反思，以至于衍生出一些从传统经礼学角度来看颇为“另类”的礼制设计主张，这一点在东晋几次关于庙制的辩论中显得尤为突出。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古礼制史研究同样存在“义数之辨”，不少研究者对礼制领域一些重大变动的解读是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相结合，这种思路预设了礼仪制度会忠实地反映整体社会背景。应当说，这一看法在先秦时代并无很大问题，但是在中古时期却未必如此，《新唐书·礼乐志》云：“由三代而上，治

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汪晖先生在《天理之形成》一文中将这一现象概况为“礼乐与制度分化”,简单地说,早期的礼更接近于真实的社会政治制度,而随着社会分化进程的加剧,礼仪制度与行政司法体系日益分离,礼仪不再与兵刑钱谷之类的实际政务有关。很显然,礼与制度的分离趋势,自然会使得礼对实际社会政治的反映能力“变弱”,以郊天礼为例,理论上看,王肃“一天说”自然比郑玄“六天说”更有利于王朝大一统,但事实上,我们却很难在每一次王肃学说在制礼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时都观察到这种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有时这种反映甚至会出现一些“扭曲”,例如,元代宗庙礼中一些仪节,常常被置于蒙古族传统宗教祭祀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解读,而事实上,通过对比元代仪注与唐宋礼制,却发现元代宗庙制度其实更接近汉代古礼传统。

朱熹曾感叹,“礼学多不可考,盖其为书不全”,《四库总目·礼类三》亦云:“礼不可以空言解。”文献学的视角,无论对于礼的哲学内涵还是名物制度层面的研究都不可或缺。本书第三部分关注的正是两种中古礼书文献,它们分别代表两种对“礼”的不同分类方式,本应在中古礼制史占有重要地位,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或多或少被过去的研究所忽视。第一种是历经齐梁两代递修而成的《五礼仪注》,作为一部近千余卷国家礼典,此书卷帙之浩繁,远超后来的《开元礼》,而齐梁两代名儒、学者多参与修撰,更堪称学术史上的盛事。就体例而言,仪注之体较说经之文切于实用,因而此书更能反映当时行用仪制,故称其为南朝礼乐制度之渊薮,实非过誉。可惜的是,此书经太清之乱,毁去大半,至隋时已不足百卷,故历代学者均未加重视。陈寅恪先生曾论及隋唐礼仪制度三源中梁陈之源,对于与这部书相关的问题也探讨较少。第二种是《宋书·礼志》,我们知道,从魏晋开始,五礼制度开始成熟,但《宋志》的编纂却独辟蹊径,选择了对《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两分的形式加以继承与改造,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独特体例。在“五礼”体系成为礼乐制度主流后,这种独特的作法渐渐为人们所遗忘了。

书内第四部分收录的是对三种正史礼志的校勘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礼志》《宋书·礼志》《南齐书·礼志》中存在的失校、误校、标点不当等问题。

目 录

小 引	1
第一编 《礼记》与先秦儒家礼论研究	
孔子道论中的创造性与“实得”概念：从王船山到安乐哲与陈来	3
一、游夏之爭中所见道的内在矛盾：“心行合一”与行道“动力不足”	8
二、孔荀礼学中的“通道”观：作为规则的道与义	17
三、实得之道：礼道的两个层次及与“仁”的关系	29
《礼记》中的“义数之辨”——对《礼运》《礼器》中两处文本的重新解读	45
一、“义”作为礼之意义：“礼以义起”辨析	46
二、“义”作为忠信之德：《礼器》“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辨析	56
三、余论	64
“忠信为本”还是“义理为文”——《礼记·礼器》篇主旨探微	66
一、对几处行文属于“忠信为本”或“义理为文”的考辨	70
二、“远人情者”——“义理为文”的确切涵义与由敬文而言情	83
先秦儒家礼学中情与文关系试探：从孔子、子游到荀子	91
一、重仁与情文取中：孔子礼论的两个向度	94
二、“微情”与“以故兴物”：子游情文礼论的发展	97
三、情文俱尽——从子游到荀子	104
第二编 中古郊庙制度考论	
魏晋及南朝郊祀礼沿革之经学背景探微	109
东晋庙制理论及其经学背景	111
东晋庙制理论及其经学背景	128

一、刁协、贺循的庙制设计方案	129
二、华恒与温峤的方案以及东晋庙制的最终确定	135
三、其他礼学家庙制评说	139
元代宗庙礼中蒙古因素的重新审视——以“蒙古巫祝”职能为中心	142
一、蒙古巫祝的两类职能与“割奠、致辞”问题	142
二、蒙古巫祝作为“司禋监官”之渊源	148
第三编 中古礼书编纂体例与成书研究	151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153
一、《后汉志》《宋志》分卷体例对比	154
二、《宋志》收录材料性质分析	160
三、《宋志》诸礼次序及与《后汉志》比较	168
齐梁《五礼仪注》修撰考	177
一、修撰始末	177
二、齐梁《五礼仪注》在礼制史上的意义	202
第四编 正史礼志校勘献疑	219
中华书局本《晋书·礼志》《宋书·礼志》校勘献疑	221
点校本《南齐书·礼志》献疑	233

第一编

《礼记》与先秦儒家 礼论研究

孔子道论中的创造性与“实得”概念： 从王船山到安乐哲与陈来

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关于道的内涵，却与对仁的理解一样，至今仍众说纷纭。杨伯峻先生认为在《论语》中，“道”有“道德、学术、方法”“合理的行为”“技艺”等八种含义^①，颜炳罡先生认为这主要是“从文字、语言学角度理解”，“没有指出道的哲学意义”^②。现在，研究者们已经很少单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更多地通过将道与孔子哲学中其他重要概念，尤其是仁、义、礼三者进行对比，来探讨孔子道论内涵。^③

例如，劳思光先生认为孔子“论道大抵以仁为主”^④，这是主张道为仁道的说法。韩石萍先生则认为，孔子之道“以义贯之”，道之本体是“义”，是“理”，而达到这一本体之方法以及道的价值也和“义”与“理”密切相关。^⑤ 主张礼道说的学者，如蔡尚思先生认为：“当孔子把仁礼合一而论时，实质上是以礼为仁，纳仁入礼，礼为目的，仁为手段。”^⑥

无论仁道、义道，还是礼道说，都有着文献及义理方面的证据^⑦，但是一方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93—294页。

② 颜炳罡：《孔子道的形而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③ 这里限于篇幅，我们只选择了明确以孔子之道为研究对象成果中的一小部分代表性说法，至于将道广泛地视为“孔子哲学”“孔子推崇的生活方式”等，此类研究成果更多，兹不备述。

④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⑤ 韩石萍：《孔子之道“义”以贯之》，《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

⑥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0页。严格来讲，此说是以仁礼合一论道，更明确主张礼道说者，如梁家荣认为：“复礼才是孔子之道的最终目标，仁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条件。”（《仁礼之辨——孔子之道的再释与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页）此外，劳思光先生也曾提出礼乐之道为孔子早年的思想。参看氏著：《新编哲学史》（第一卷），第115页。

⑦ 另有学者提出如忠恕之道、中庸之道的说法，在此不备举。

面,这些说法互相矛盾,更重要的是,将三者作为道之内涵,这些重要范畴自身与道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论语·先进》“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杨伯峻先生翻译为:

最符合仁义的内容和方式。^①

这种译法固然无可厚非,但无形中还是将道等同于仁义,这样一来,道本身完全由仁义之德来决定,难免有虚位化的嫌疑。^②

纵观学术史,我们注意到三种诠释思路,既结合仁、义、礼,但同时也赋予道以独立地位。这三种说法同时都涉及道之规范性与行道动力、内在依据的问题。

古代学者中,王夫之对孔子道论的诠释汇通仁义礼,极富创见。他认为“仁义之用,因于礼之体……礼生仁义,而仁义以修道”。以道为“古今之圣教,天下之显道”^③,又言“德因行道而有”^④,凸显了道之独立价值。但另一方面,王氏又提出“德实”而“道虚”之说:

盖道,虚迹也,德,实得也,故仁、义、礼、智曰四德……而若诚、若直,则虚行乎诸德者……直为虚,德为实。虚不可以为实。^⑤

“虚道”说目的是为了防止将道视为纯粹外在规范,实得之德则是道的基础与动力所在。^⑥ 故云:

① 《论语译注》,第134页。

② 正如韩愈《原道》所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德”只是评价式的含义而没有描述式含义,只是说“这是道、这是德”,而不像是“仁”“义”,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更有对评价内容的说明。

③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1975年,第126页。船山解释《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句认为:“郑氏之失,总缘误将信字作虚位说……(朱子)但云信得深固,其所信果为何事? 朱子言外、意中有一‘道’在。”(《读四书大全说》,第329页)

④ 此本朱子《集注》“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说,而更突出道之功用。

⑤ 《读四书大全说》,第307页。“诚”与“直”今天看来也是德,船山却归于道,而与四德之实得不同,后文将有详述。

⑥ 尽管有时由于重德,道也显得彻底虚化:“忠信之外有道,而忠信为求道之敲门砖子,不亦悖与? 君子之大道,虽是尽有事在,然那一件不是忠信充满发现底? 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双峰则是以道作傀儡,忠信作线索,拽动他一似生活,知道者必不作此言也。”(《读四书大全说》,第51页)

虚不可以为实。必执虚迹以为实得，则不复问所直者为何事，而孤立一直，据之以为德，是其不证父攘羊者鲜矣。^①

船山“道德合一”之道论可谓集宋明理学之大成，某种意义上，与之遥相呼应的则是西方学者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②，书中指出：

道存于人，由人发扬、习得。而且每个人都是以绝无仅有和在质的意义上不同的方式接收和体现道的。

道是人类文明绵延不断的过程，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勘察和铺垫出的人类经验的一种诠释。^③

这里的道无疑是一种实道，作为文明的传承，深深植根于人之存在，从而具有独立价值。相比船山之“虚道”，尽管不再将天性之德作为道内在依据，但这种道论仍很依赖一种道之外的因素，那就是对“义”的创新性理解，“人所特有义一个重要作用即它是道的最初根源”。^④以此为基础，两位学者对道之内涵与仁、义、礼之间的关系，较之其他研究，有着更为系统、清晰的整合。首先，道与仁同样作为一种“过程性”存在而具有一种“成就”的意味，仁作为“人之造就”，道作为“世界之造就”。^⑤其次，道在存在形态上与礼有着极大的重合，礼可以视为道的

^① 《读四书大全说》，第 307 页。

^② 颜炳罡先生认为此书是“对《论语》的道进行哲学解读最为完整者”。见颜炳罡：《孔子道的形而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

^③ 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凤凰出版社 2012 年，第 180 页。

^④ 《孔子哲学思微》，第 68 页。颜炳罡先生对此说提出了批评，他举出了“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与达其道”（《论语·季氏》），认为“行义是致道的手段、方式、方法”，义与道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这种批评固然很有道理。但郝大维、安乐哲的认为义是道的根源，主要与他们重视道与义的创新性有关，且关键在于，这种“创新性”反对的恰恰是“超越式”的理论概念，“应竭力防止将这些纯概念的区别具体化，以避免运用手段——目的、方法——目的的范畴”。“要更忠实地刻画义，就不能使用超越的语言。”（《孔子哲学思微》，第 74 页）

^⑤ 《孔子哲学思微》，第 179 页。不过当说到“道的最终源泉是个人在造就自己时所作的努力”，似乎仁与义都视为道之源泉了。书中还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人类展现意义的能力，而它的改造及适当的应用则在于个人的独特性。”（《孔子哲学思微》，第 186 页）这里礼的根源仍在于人所具有的某种创造性。

“内部结构”^①。

两位学者对孔子道论的研究,与王夫之类似,指向的是一种融汇了仁与义的礼乐之道,其中包含颇为独特的重要观点:“领会道的新颖性和创造性”“重视道的连续性”。我们认为这两点基本上值得肯定,但相应地,也有两处需要补充与修正:

关于创造性原则,是谈及较多的,主要基于义与道的关系:

在各个历史时期,每一个重要的文化人物不仅以一种同他的环境相适应的独特方式体现道,而且由于他的创造性贡献,他能够以新的方式建立道。^②

道之创造性不仅仅体现在伟人身上,而是任何处在具体情景中的行动者都必须遵从的:

情境人不能为一些决定性原则所摆布,而必须作出自己的创造性判断,以同它的当时情景保持融洽。^③

对此,我们认为,对创造性的强调,不应建立在否定道之规则、规范义的前提上,就孔子学说中道与义的关系来看,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义决定了道或礼。

与创造性原则紧密联系的是关于道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层次间连续性,也就是作为“质”之道的说法^④,被引用的相对较少,但仍很重要:

道必须用质的概念加以描述……可以把道描述为一组文化矢量,这组矢量通向各个方面,收束于一个概念性的聚结,由于道具有重要性不同的许多领域以及程度不同的成就,所以道的较低层次可以是十分琐碎的东西,而其

① 《孔子哲学思微》,第 186 页。

② 《孔子哲学思微》,第 181 页。

③ 《孔子哲学思微》,第 67 页。

④ 此处明显可以看出其与前引道与仁作为一种成就、过程意义说法的联系。